

治愈垃圾量焦虑

潘真

某日,为赶在垃圾房关闭前完成任务,不小心受了点轻伤。朋友们获悉,纷纷送来安慰,还使劲夸我是垃圾分类的模范。您别说,我们小区所属的街道,就在前些天荣膺了上海垃圾分类综合考评排名第一呢!

眼见越来越多的市民习惯成自然,垃圾分类蔚然成风,可我的垃圾量焦虑还是无以减轻,岁末年初尤其关注上海去年的垃圾产出数据。直到最近,有机会去上海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采访,了解到垃圾处理已进化到怎样的程度。

松江区湿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是环境院引以为豪的项目。佘山镇上海天马焚烧厂北侧的这一工程,总投资8亿多元,每天可处理湿垃圾530吨。

你以为湿垃圾是一股脑儿倒进某个超大机器处理的?看看一体化车间、污水

处理车间、沼气发电间、风机房和污泥脱水车间、消防水池和泵房、调节池、生化池、厌氧罐、沼气和气柜……这些个设施,就是足以想象湿垃圾在这里的待遇。

预处理,分餐饮垃圾处理线、厨余垃圾处理线和废弃油脂处理线三条处理线。湿垃圾进场称重后,经坡道进入卸料大厅,其中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经分拣、破碎、生物淋滤水解、固液分离、沉砂等一系列工艺,去除杂质后,有机物料厌氧消化产生沼气,沼气经脱硫除水净化后,成为发电的清洁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多吨。沼液沼渣混合液进行沼渣脱水,脱出含水率低于80%的沼渣,外运焚烧;沼液经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废弃食用油脂去除杂质后,与餐饮垃圾预处理脱出的油脂一道,经酯化反应生产粗甘油和粗脂肪酸甲酯(生物柴油),

产品出售。

传统观念中,垃圾处理场周边又臭又脏,环保措施跟不上,附近居民避之唯恐不及。然而,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前端除臭+末端除臭”相结合,前端除臭采用植物液空间雾化、送新风、风幕机阻隔工艺;末端除臭通过负压控制收集,不同区域的末端除臭采用化学洗涤、生物除臭、植物液洗涤和活性炭吸附多级工艺组合处理,达标排放,有效控制异味。污水处理系统,凭借“MBR+纳滤+反渗透”组合工艺,达标纳管排放。预处理产生的杂质、渣渣和脱水后的沼渣、污泥,则外运至焚烧厂,与干垃圾掺烧,杜绝二次污染。

关于垃圾处理,最新的好消息:上海生活垃圾全程分类收运体系基本建成,末端处置能力显著增强。全市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理能力达每天2.8万吨,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与每个人每一天息息相关的这条新闻,读来如春风拂面,空气中充盈着负离子,呼吸为之顺畅——我的垃圾量焦虑,终于被治愈。

施蛰存与北山楼

陈文波



对写作者而言,书斋,是一个私密的地方。这里是创作的天堂,是安放他们内心灵魂的所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书斋如“饮冰室”“人境庐”等等,与他们的主人一起,广为人知,并成为不朽。

上海愚园路1018号,是松江籍著名作家施蛰存先生的旧居,他的书斋“北山楼”位于小楼的二楼。当年,施蛰存不仅以“北山”为书斋名,还常以“北山”为笔名,写下大量珍贵的文字。

“北山”在哪里?何以令先生念念不忘?这还得从上个世纪40年代说起。当时,正处抗战时期,施蛰存任教于内迁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校址位于风景秀丽的北山脚下,先生在此备课写作,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也在这个时候,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北山楼”,并沿用至逝世。

施蛰存一生曾用过多个书斋名,唯有“北山楼”陪伴他到最后。他曾说过:“虽然我离开了那里(长汀),回到上海,不管什么处境,书斋名称却从未更易。”

上世纪80年代,施蛰存的大量著述得以出版,其中不少书籍都以北山为名,如《北山谈艺录》《北山楼诗》《北山散文集》等等。在这背后,可见他对这个书斋名字的喜爱,对福建长汀那段岁月的留恋。

那是1941年6月,施蛰存第一次踏上长汀——这个当年中央苏区的“红色小上海”。他是因厦门大学苏本栋校长的邀请,前往长汀任教。

显然,在长汀,在厦门大学的日子,是施蛰存前半生最平静和惬意的时光。由于厦大图书馆的藏书毫无损失,全部内迁,除了教书,施蛰存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书籍,并开始翻译介绍到国内。同时,施蛰存还开始辑录《金石遗闻》《宋元词话》,并专门给学生开了一门专书选读课,很受欢迎。厦门大学教授郑启五的父母均是施蛰存的学生,他曾在文章中回忆:“施蛰存教授在厦大的国文大课,精彩至极,受到学生们热烈的欢迎。”

在长汀闲暇的日子里,散步是施蛰存最喜欢的运动。当时,他最喜欢去南寨散

步——这是长汀一处著名的景点,有一大片梅林,“我们每天下午都到那里去散步。”而长汀的山山水水,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章中说:“长汀一带,没有名山胜迹,都是平凡的山岭……山里永远是长林丰草,除了打柴采茶的山农以外,不见人迹,除了鸟鸣蝉噪,风动泉流以外,不闻人声。我就喜欢在晴和的日子,独自一人,拖一支竹杖,到这些山里散步。”

在山中,他寻觅到许多乐趣,“认识各种树木,听听各种鸟鸣,找几个不知名的昆虫玩玩,鹧鸪和‘山梁之雉’经常在我前面飞起,有时候也碰到蛇,就用手杖或石块把它赶走。”当时的长汀,还属于很偏僻的地方,市场甚至还能见到老虎肉。喜好美食的施蛰存遇到之后,自然不会放过,不仅亲手烹调,还与好友一起分享,并写诗记之,“乙威遽失腹中势,九鼎翻成席上珍”,记的就是这件小事。

散步、做学问,这样的日子看似世外桃源,但当时,经常来的日军飞机轰炸提醒着人们:这还是一个残酷的时代。长汀也是瞿秋白先生就义的地方,施蛰存回忆道:“瞿秋白是我的老师,他是被国民党杀害在长汀的北山山脚下,他的墓就在离我当时住的宿舍不远处,我每天路过,沉痛无尽。”在这样的环境下,施蛰存坚持做学问之余,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据他的学生马祖熙回忆:“(他说)在中华民族最艰危的日子里……一定要加倍珍惜时间,在苦难中锻炼自己成材,将来才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复兴祖国尽自己的一点心力。”

1945年7月,因碍不过友人的情面,施蛰存到福建三元任省立江苏学院文史系教授。对于这次转校,施蛰存颇为不舍,“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失策,如今想起来都有些后悔。”

虽然离开了北山,但这段日子一直铭记在施蛰存先生心中,并以书斋名作为纪念。

如今,我们走进位于上海愚园路上的施蛰存旧居,这里早已变了模样。旧居被改造成愚园百货公司,入驻了网红咖啡店和时尚店铺,沪上的文艺青年们,纷纷来此打卡。当年高朋满座的“北山楼”,已经没有了作家生活过的痕迹,唯有门口的一块牌子,提示这里曾居住过一个文坛上的风云人物。

我看张爱玲

黄抒婷



我是张爱玲粉,19岁开始看张爱玲,一遍遍地看,反复地看,百看不厌。一直想写她,但是不敢,因为那么多出色的人都写过她。近日,从友人那里得了一本白落梅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看完了她的一生,再也忍不住,决定提笔写写她。

张爱玲,她的一生毋庸置疑是辉煌的,那么多流传于世的作品,给了她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女性几乎最高的荣誉,当然是星光灿烂。20出头,她就能写出那样的高于她自己年龄的小说,那种看穿人世一切成熟的成熟使人怀疑作为一个少女她是否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她的文字灵动而低调,充满与生俱来的忧郁,随便的一眼,她就能在阳光下看到并穿透人性的黑暗,在她的笔下所有人的虚伪无处藏身。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张爱玲真的如她表现的那样成熟,那样洞察一切,那样两个手指一捏就能拿住所有的阴暗吗?我总是觉得,写文字或者喜欢写文字的人,心底深处都是常驻着一个单纯的自己,无论在现实中怎样表现得成熟和世俗,在提笔的那个瞬间,那个天真而单纯的自己就会从心底到指尖然后跃然纸上。

作为一个女人,如果同时拥有颜色的平庸和才情的出众,那就无法评说是幸或不幸了,张爱玲好像就是如此。白落梅的书里写到胡兰成第一次看见她时,“只觉与我理想的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白落梅说不知道胡兰成的初见是惊奇,是迷乱,还是失望?我感觉更多的是失望。他心中的那个张爱玲,一定是应该长得更漂亮的,至少跟她的文字一样脱俗忧郁抑或风情万种。但,显然不是。然而张爱玲坠了进去,她说“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儿来。”她是万分欣喜,满怀感激和憧憬的。所以说张爱玲

归根结底是单纯而厚道的,她不知道爱情是漫长的旅途,再美的风景看着看着也就平淡了,一路走去仅仅靠才华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对胡兰成这样本身极具才华的人是不够的,他需要不同的风景,他需要每一段旅程的标新立异。张爱玲希望胡兰成是陪她一起走路的人,而胡兰成只是需要一段与众不同的风景。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对服饰,打扮,房间的细节都是那样的精益求精,但几乎都是悲剧,她们对男人都各有吸引力,我想这也是张爱玲自己的期盼。但悲哀的是,现实中的张爱玲其实应该是缺乏这方面的魅力和天赋的,她很早就发现这一切,所以她高傲又冷漠,仿佛藐视一切男人,实际上是缺乏去接近的自信,然而掌控男人的风箏线松松紧紧之力毕竟是需要实践,而非靠大脑想象和书本阅读就可以成的。对于胡兰成,张爱玲虽然没有十足的放飞能力。胡兰成和张爱玲的那纸婚书,于张爱玲是“死生契阔,生死相依”,于胡兰成仅仅是一张纸,是无数段值得回忆的才子佳人的桥段之一,当然可能会和其他桥段有一点点不同,也就是一点点罢了。

张爱玲童年生活的不幸注定了她一生的幸福会比常人的获得更为不易。之后的被误解,去香港,辗转加州、洛杉矶,遇到赖雅共同生活或者说她照顾了他十年,所有人都为她惋惜。但是静下心来想想,也许这就是张爱玲想要的生活,不被束缚,不被深爱也不深爱别人,能用自己的笔为自己赚生活费,对于这个童年伤害太深、年轻时红遍上海滩又心智在成熟与单纯之间界限如此模糊的奇女子来说,也可算是老天的深深眷顾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短暂的生命中同时拥有非凡的才华,梦寐以求的容颜,珍惜自己的爱人和富足无虑的生活。

生活茶座

周良弼书

黄浦故道探索之四

元松江府漕粮运输

杨坤

在哪里?似乎是个谜。

绍熙《云间志》称华亭、昆山两县,水程“相去一百三十三里”。但《漕运水程》的记载,则完全不同。“今以昆山州太仓聚船去处,至九路仓分,平江路一百八里、无錫州一百九十八里、常州路二百八十八里、海盐州三百四十里、湖州路三百一十八里、松江府三百六十里、乌泥泾四百八十六里、江阴州四百五十里、镇江路六百八十里。”这显然是设计好的行船路线,一圈兜下来装粮,才会有从昆山州太仓至松江府三百六十里、至乌泥泾四百八十六里这样的数据。

但问题又接踵而至。如乌泥泾距离松江府城,只有四十五里。但《漕运水程》至乌泥泾与至松江府相较,又增出一百二十六里,很明显是又绕了个大圈。曷以如此?大概是也是因为水道淤塞的缘故,导致搬运漕粮的海船,无法就近从松江仓驶抵乌泥泾仓。

从文献记载看,早在南宋干道七年(1171),自乌泥泾到华亭县城的主要河道北俞塘,已有淤塞,亟待疏浚。干道八年,王淮在其报告中,提到“邻于海而易

泄者,惟秀之青龙港”。而元代任仁发《水利集》、麻谷《集议吴松江堰塞合拯治方略》、吴执中《水利论》,都指出当时的吴松江,是通过上海县境内的新泾而流注于海。这条“新泾”,就是宝元初年叶清臣取直盘龙汇而开挖的新渠。由此不难看出,宋、元时期的大湖水通过吴淞江泻海,青龙江、新泾是中、下段重要衔接水道。

查检弘治《上海县志》,在高昌乡三十保有“华漕”。邻近新泾,水道相通。宋、元时期,“华漕”因为连接青龙江,为夷贾贸易必经所,当地富家以奇货相雄。盘龙浦流经的诸翟,是钱鹤皋老家所在,也毗邻华漕。因为有这样周边经济地理大环境的缘故,所以怀疑“花泾”也许就是“华漕”。

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太仓海船来松江府搬漕粮,一定是先到平江,再经御、淀而东,才能有三百六十里这样的里程数据。但如果从华漕取道新泾,再到乌泥泾的话,里程又要增加一百二十六里,这数字就很夸张了。是否还有迂回?待考。

快来到松江明星剧场演出。这些上世纪30年代就受到松江观众喜爱的老演员已多年不上舞台演出,却在古稀之年,带着他们的拿手好戏重回“娘家”演出。

筱文滨的一曲拿手好戏《陆雅臣叹五更》倾倒了无数沪剧迷。《叹五更》中的牌名赋、生肖赋、鸟名赋、花名赋、虫名赋,更是脍炙人口,加上他委婉动人的文派唱腔,博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

“七石缸里打拳——搥缸(松江)”,篱笆眼里看戏——张着(泽)”,王筱新演唱的《游码头》,一气呵成,把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码头都唱遍。年近七旬的他脸不红,气不喘,风采不减当年。

施春轩与丁婉娥合演《求岳母》,珠联璧合,幽默风趣,观众笑声不绝。沈筱英与沈筱民合唱的《庵堂相会》“问叔叔”唱段,委婉动听。当年沪上四小名旦之一的沈筱英,虽年近古稀,但嗓音圆润流畅,不亚于青春少女。赵掌生、丁惠琴的《借当局》,刘子云、施文韵的《借红灯》等,都是上世纪30年代脍炙人口的骨子老戏,当年舞台上已难看到,因此备受观众欢迎。

这次“回娘家”演出,仅演四场,场场爆满。观众中老年观众居多,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为“中山社”“敬兰社”等申曲团体伴奏的著名琴师谢永泉,也闻讯前来探望他早年曾同台演出的老友。



老黄牛 篆刻:陈永春



文化走廊

百年沪剧与松江(二十七)

周平

松江的两次沪剧界“回娘家”

沪剧(申曲、本滩),是上海的“土特产”。她是上海地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剧种,以独特的文化载体方式,记录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形成、发展和繁荣的历史。1982年1月,沪剧界首次“回娘家”活动在松江举行,是由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建议,上海沪剧团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倡导,并得到沪剧界和电台、电视台的支持。

“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更好地推动上海沪剧界把演出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为农民服务。”那为何首届沪剧界“回娘家”活动会选在松江?上海沪剧院副院长洪立勇和该院艺术室主任褚伯承如此说,“松江是沪剧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当地群众对沪剧喜闻乐见,怀有很深的感情,这里的业余沪剧演出活动开展得特别红火,曾有不少节目在全市和全国获奖,同时也为专业沪剧演出团体输送了很多优秀人才。所以,当年筹备沪剧界‘回娘家’活动时,丁是娥就把松江作为这一活动的出发地。”

那年的1月6日,沪剧老前辈们在新桥乡参观了敬老院、食品加工厂、种子场、农民新村,与劳模、先进进行了交流。“女儿不断娘家路”,这里的乡亲敲锣打鼓,迎来了自己的沪剧女儿。松江县业余诗人曾有诗云:“迎春蜡梅竟开放,九峰三柳披彩霞;新桥人民久盼望,喜迎亲人‘回娘家’。”

据《上海沪剧志》记载:那年的1月10日,艺术家们又在松江人民剧场举行了专场慰问演出。节目有《歌唱新桥新气象》《罗汉钱》选场和《女看灯》等。丁是娥、石筱英、邵滨孙、解洪元、凌爱珍、韩玉敏、杨云飞、赵春芳、王雅琴、王盘声、小筱月珍、汪秀英、丁国斌等参加探亲及慰问演出。



沪剧表演艺术家们在松江“大会师”的合影



汪秀英在新桥为农民演唱《史红梅》

著名作曲家许如辉(笔名水辉)在他《沪剧界盛大集会》遗稿中透露:这次大会串,剧目还有石筱英、王雅琴的传统戏《阿必大》,杨云飞、丁国斌的《为奴隶的母亲·回家路上》,故事出在松江的赵春芳、杨飞的对子戏《卖红菱》;小筱爱琴和他父亲邵滨孙合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密室相会》。另外,这次在松江举行沪剧大会串,是为向松江农民访问、学习、拜新年而集会的,为此特排了一曲《阳档》这一富有农村载歌载舞传统的大联唱。

曾有沪剧老法师记载,1963年秋,筱文滨、丁婉娥、王筱新、施春轩、施文韵、丁惠琴、刘子云、沈筱英、赵掌生、沈筱民等联